



全球化译丛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任友谅 金燕 王新霞 韩进草 等译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

Les défis de la mondialisation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全球化译丛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

[埃及]萨米尔·阿明 著
任友谅 金 燕 等译
王新霞 韩进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埃及]萨米尔·阿明著;任友谅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
(全球化译丛)
ISBN 7-80149-857-7

I. 世 II. ①萨… ②任… III. 一体化—研究—世界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338 号

·全球化译丛·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



著 者:[埃及]萨米尔·阿明
译 者:任友谅 金 燕 王新霞 韩进草等
责任编辑:严 波 许春山
责任校对:闫晓琦 张景秋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电话 65137751 邮编 100005)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9
字 数:211 千字
版 次: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857-7/D·148 定价:18.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2-1714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Les défis de la mondialisation

© Éditions l'Harmattan

本书由法国阿尔马唐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

《全球化译丛》总序

亚洲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即将加入 WTO 之际，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迅速成了热点。从 1998 年我们主编国内学术界第一套《全球化论丛》后，在不到 2 年时间内，国内出版的关于全球化的编著和译著不下数十种之多。这不仅表明人们更加关心全球化问题，也表明对全球化的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不仅表明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在深化，也说明国外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仍在向前推进。

薛晓源同志主编的这套《全球化译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9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这套译丛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的多学科性。译丛第 1 辑由 5 本著作组成，它们分别从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对全球化问题做了广泛的探讨，这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全球化进程所做的多学科反思。然而在这个共同表征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细心的读者在研读完这 5 本译著后将会发现，这套译丛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目前在全球化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现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超国理论（supernational theory）。

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

过程，但是归根结蒂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也或多或少开始出现了。与此相适应，全球化理论具有很大的综合性，至少包括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基本内容。

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于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如新左派或新右派理论、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更不用说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声音。

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着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做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

全球化理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全球化研究将是 21 世纪很长一个时期内各国学者的共同课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不仅意味着努力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也意味着更多地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在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够更多地听到中国学者的宏亮声音。希望这套译丛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全球化研究，我想，这也是丛书的编辑者和出版者推出这套丛书的基本宗旨。

俞可平

2000 年 8 月 19 日于北京新风南里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的地区体系	1
第二章	亚洲在古代世界氏族体系中的地位	38
第三章	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	60
第四章	当今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开放的还是控制的自由化？	101
第五章	世界一体化和金融化	118
第六章	面临挑战的欧洲	150
第七章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模式	180
第八章	世界体系中的俄罗斯：地理还是历史？	191
第九章	阿拉伯世界的新买办化	202
第十章	非洲经济灾难的根源	213
第十一章	获得自由的战略	229
结论	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回顾	250

第一章 古代的地区体系

现代世界绘出了一幅世界历史图，根据这幅图，资本主义（欧洲）是第一个统一全球的社会体系。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种惯常的说法过分地简化了现实情况。在我看来，它是欧洲中心论的典型产物。实际上，16 世纪以前的社会绝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若干地区性体系内部互相竞争（甚至可能是在一个全球体系内部）。低估了这个事实，就无法理解这些社会内部变革的动力。同时，我坚决认为资本主义代表了世界历史上一个质的飞跃，它开始于将近公元 1500 年时。我也要强调，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前社会中的原始资本主义因素（有的出现于很久之前）相比，是有区别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要强调，那种全球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中心—周边力量对比的结构极为特殊，与此前的力量集中式的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

1. 资本主义社会与过去的社会之间存在的特殊矛盾

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马克思的）的决定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此，后人对于这一理论的诠释（当然，这在眼下可是风行一时）并不能说明问题。边际生产成本包含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概念，这些生产资料本身也是劳动产品。前提条件则是：生产力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与手工生产

及其工具设备相比)；在此基础上，社会分为两个基本阶级，这就要求社会劳动具有自由雇佣劳动的性质。这样，普及了的资本主义市场就形成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经济规律，作为不受主观意愿束缚的力量，起着作用：经济剥削和经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体现了这一点。

在现代社会之前，没有任何社会建立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相反，16世纪以前的所有发达文明的社会，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将其定性为氏族性社会。我要着重指出一个本质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社会中，剩余财富是通过与权力等级制度紧密结合的透明手段而向农民阶层直接抽取的（权力是财富之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规则恰好反了过来）。体系的再生产要求有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国家宗教掩盖权力的组织形式并赋予其合法性（而资本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则掩盖了经济剥削，赋予其合法性，作为补偿，它的政治关系相对透明，这也是现代民主诞生的一个条件）。

我曾在几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论中表明过立场，我认为有必要在此重复一下我的主要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指导着我关于前一现代体系本质这一问题的观点。

我不同意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五个阶段”的说法，更具体些说，就是不同意（i）把奴隶制看做是所有社会的必经阶段；（ii）把封建制看做是奴隶制之后的必经阶段。我也不同意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两条道路”的说法，更具体些说，就是不同意：只有“欧洲”道路（奴隶制—封建制）才能产生资本主义，而“亚洲”道路（所谓的亚洲生产方式）只会形成一条死胡同，无法自行发展。我把这两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說法称为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至于我的观点，我已经在《阶级和民族》中阐述过了。

就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两个“生产方式家族”必然相继

出现：集体式家族和氏族式家族。原因是：在一般性的发展中，我着重强调两次质的飞跃：(i) 后一次是：氏族式社会阶段是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国家+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资本主义阶段是经济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普及市场+经济意识形态）。(ii) 前一次是：集体社会阶段的无国家和姻亲意识形态；氏族社会阶段的国家权力和形而上学意识形态。我的这种说法指出了这两次飞跃的多种形式，尤其定义了氏族社会阶段的“中心/周边”形式，这是周边氏族式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一些人认为，我所称的“氏族式”并不能构成一种生产方式。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如果这个词不合适的话，我就把“氏族式生产方式”换成一个更泛泛的词“氏族式社会”。

当然，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找“普遍规律”。其中，我提出的那些基本概念，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也打上了“原始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印记。但是，当然有一股思潮存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正是一帆风顺——它拒绝寻找任何普遍规律，相反，只致力于强调不同发展道路各有各“不可克服”的特殊性。我把这种认识论取向看成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这种理论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证明西方“优越性”的合理。

2.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特殊性

我使用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词，想指的是：体系的变化发展划出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地区性“调整”起着作用。换句话说，这种体系观点使得“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的区别相对化，因为在全球体系范围内，所有的因素都是内部因素。很明显，这种方法论观点把我们与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资产

阶级甚至马克思主义)分离了开来。这些思潮的观点是:内部因素是决定性的,因为每种国家形式(“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都主要源于它的“内部”因素,比如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说的“有利”或“不利”因素。

此外,我的分析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和先前的社会有质的不同,前者的主导是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规律),后者的主导是政治意识形态。

现代全球体系(资本主义)和先前的所有体系(地区性和民族性的)都有着本质区别,这个本质区别要求我们就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做出评价。通过“全球化价值规律”这个词,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一般说来,价值规律的前提条件是:融合了社会劳动产品(然后就成为了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市场。这样,在价值规律起作用的空间内,这个规律就会使同类商品价格、资本利得和劳动报酬(形式为工资或小生产者生产所得)趋同。在中心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内,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基础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这个市场融合了商品交换和资本运作,但却不包括劳动力。全球化价值规律倾向于统一商品价格而不是统一劳动报酬,但是,实际上,劳动报酬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方式比生产率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方式要多得多。

通过全球化价值规律表现出来的力量集中,无论在质上、量上还是作用空间(整个星球)上,与先前的民族性(地区性)体系内部的力量集中都不可同日而语。

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所代表的质的飞跃绝对有效;它表现为根本的颠覆:经济意识形态代替政治意识形态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所有先前的体系在本质上不同,那些体系,无论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多紧密,它们也

必然只是地区性体系。只要这种根本颠覆没有发生，我们就只能用原始资本主义因素这个词，如果这些因素存在的话，也是受占主导地位的氏族式意识形态控制的。因此，我不能同意下面这种说法，它抹杀了质的飞跃，而认为这种飞跃只是一个号称永恒的、由来已久的“全球体系”连续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不能低估资本主义这个质的飞跃的重要性。但是，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当我们剥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它披上的神圣外衣时，我们也发现了它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无法再写出简单的、安抚人心的方程式，比如说：资本主义（如今是“市场”）= 自由和民主，等等。我和卡尔·波朗依（Karl Polanyi 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剥削的理论是很重要的。我和他有相同的结论：从本质上，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的同义词，相反，却是压迫的同义词。我们要重新承认社会主义理想具有伟大意义，它的目的在于解脱奴役，而过去人们常常想否认它的意义。

欧洲中心论并不否认资本主义所代表的质的飞跃和它开辟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是相对的、有历史局限性的），它也不是一份“忏悔书”，宣布不再把这一进步定性为欧洲的独创。换个角度来说，这种观点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时代所造成的矛盾：这个体系征服了世界，但却没有使这个世界整齐划一，相反，它造成了所能造成的惊人的力量集中。因此，如果我们不再继续追求这一体系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就不会被超越。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在《欧洲中心论》中的观点，那就是：应该用必要、可能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世界性来代替极度欧洲中心论的、资本主义的断章取义的世界性。换句话说，欧洲中心论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厚古薄今，那样的“颂扬不同”。

3. 1500~1800 年欧洲的商业化过渡

全球体系不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形成于 19 世纪后 30 年，那时“帝国主义”（意指列宁所赋予这个词的含义）得以确立，与之相关的世界殖民地的划分也已完成。相反，我们说这个全球体系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规模，这规模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中一直是一个常数。我们承认，从文艺复兴开始，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就在欧洲形成了。1492 年——征服美洲的开始——是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同时诞生的日子，这两个现象是不可分的。

1500~1800 年间“过渡”的本质是什么？以那个时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旧制度”或“君主专制”）或是经济本质（商业化）为基础，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因为，对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欧、中欧以及东欧的商业化社会都产生了疑问。在此，我们只是把形成边际生产成本的一些先决因素集中在了一起：(i) 商业交易范围的显著扩张，这类交易很大程度上都是农业产品的交易；(ii) 对私有财产的现代形式的肯定及通过法律表明对这些形式的尊重；(iii) 自由雇佣劳力的显著扩张（在农业中和手工业中）。但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把“工厂”确立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经济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倒不如说是商业化经济（受“贸易”、“交换”控制）。

所以，很明显，关键在于过渡形式。针对上面这个结论，我还有两点要补充：

第一，我们所提到的形式——有人将之定性为原始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呢）——并不是 1492 年起就奇迹般地突然出现的。在先前的若干世纪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原始资本主义。比如说很久以前，在地中海周围的地区，尤其是意大利城市以

及海对岸的阿拉伯—穆斯林地区，或者很久以前的印度、中国等等。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开始于1492年，而不是1350年，900年，或者更早呢？为什么我们只谈到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不把其他社会（阿拉伯—伊斯兰，中国，等等）也看做正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呢？这些社会中也有原始资本主义啊。在这些条件下，为什么我们不放弃过渡这种说法，转而把它当做是一个存在已久，资本主义因素也出现良久的体系的持续变化发展呢？接下来，我的第二点就会部分解释我为什么不接受以上这些说法。

第二，美洲的殖民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速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扩张。以至于理论上，我们所涉及的这三个世纪的社会体系都应该受这些因素支配。但是直到那时，事实还并非如此；相反，那些原始资本主义因素还被束缚在一个氏族式社会关系（在中世纪欧洲，是封建关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

在地中海——欧洲地区，那些意大利城市形成的紧密网络难道没有构成一个“原始资本主义体系”吗？毫无疑问，就这些城市的社会和政治组织而言，原始资本主义形式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们怎么能把这些意大利城市（甚至其他国家：德国南部，汉萨同盟，等等）从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总体中分离出来？这个总体是受封建乡村生活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习惯势力，政权分散，教会文化垄断，等等。

因此，我认为，要足够重视16世纪到18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欧洲的政治体系的变化。从中世纪的政权的封建式分散到君主专制式的权力集中，这个变化是与原始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相伴产生的。欧洲的这个特殊性很值得注意，因为在其他地方——比如中国或者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封建式的权力分散：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是在原始资本主义之前就产生了。我把这个特性归结为“周边式”封建社会的

特征——地中海的氏族式社会嫁接到了一个还大大落后于集体社会阶段的主体（野蛮欧洲）上的产物。

但是君主专制国家的形成（较晚）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氏族式国家与其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有所不同。在中心氏族式国家中，国家和占主导地位的氏族式阶级混同了起来，这个阶级只存在于这个国家内部。相反，君主专制式国家是建立在氏族式阶级的权力的废墟上的，因此，它相当依赖城市的原始资本主义（新生的资产阶级）和乡村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阶级）。专制主义来源于这两者的平衡：迅速发展的原始资本主义和封建剥削的残余。

这种特性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得到了反映，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从旧制度，文艺复兴到 17 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一时期的国家的形成，二者是同步的。我要强调的是，这种与氏族式意识形态决裂的意识形态有着特殊性，我认为这种特殊性很是先进。氏族式意识形态，在形而上学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政治机构的主导地位。为了避免误会，我要明确指出，形而上学并不是“无理”的同义词（就像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潮所描绘的那样），而是试图调和理智和信仰（参照《欧洲中心论》中我就此主题的阐述）。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意识形态革命并没有摒弃形而上学主义，但是它把科学从形而上学主义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借此也为一块新的科学领域，即社会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同时，新的国家（旧制度）的实践当然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同步进行（这绝非偶然），这也刺激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扩张。因此，我们也看到了欧洲社会迅速走向了“资产阶级革命”（1688 年在英国，1776 年在新英国，1789 年在法国），同时，资产阶级对原始资本主义发展的基座——专制制度也提出了疑问，目的在于通过民主实现他们的权力合法化的新

设想。我坚持认为欧洲人是普遍清楚这一特殊性的。在文艺复兴之前，即使欧洲人（中世纪基督教国家）认为自己的宗教更为“优越”（别的民族在这一点上也是以牙还牙！），他们也知道自己并不比东方的先进社会“优越”（就潜在的力量而言）。从文艺复兴开始，他们就知道了自己比其他所有社会都优越（至少是在潜力上），并且今后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征服全球（他们也这样做了）。

4. 从前的阿拉伯—伊斯兰体系和地中海体系

人人都知道，早在意大利城市的繁荣之前，地中海和中东的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就经历了若干个世纪的辉煌和文明。

这个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是不是一个原始资本主义体系？在这里，原始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并且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区，它也推动了辉煌文明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所阐述的看法（参照《阿拉伯民族》，《欧洲中心论》）与弗滋·芒瑟（Fawzy Mansour）（《阿拉伯世界的绝境》）的观点不谋而合，从某些方面，也接近已故的阿马德·萨代克·萨德（Ahmad Sadek Saad）的看法。抛开可能存在的分歧—或小的区别—不谈，我们都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政治体系并不受原始资本主义（商业化）力量控制，相反，是原始资本主义受占主导地位的氏族式政权的控制。

因此，我认为，阿拉伯—伊斯兰区域构成了我所谓的地中海“体系”的一个子集。

我主张（在《欧洲中心论》中）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东方（公元前3世纪）作为“地中海体系”诞生的标志。从这个时候到文艺复兴，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体系缓慢形成，首先是古老的东方（地中海东部盆地周围），然后是整个地中海以及它在阿拉伯—伊斯兰区域和欧洲区域的延伸。关于这个主题，

我认为，我们这里所接触的，只是一个从公元前 300 年（亚历山大统一东方）到 1492 年的氏族式体系。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圈”，它的统一首先是通过一种集体的形而上学思想表达出来的（区域的氏族式意识形态），具体则借助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连续若干表达形式（希腊宗教，东方基督教，伊斯兰教，西方基督教）。在这个文化圈内，我认为有必要把中心区域（地中海东岸）和周边区域（西欧）区别开来。在这个整体内部，各种性质的交流是（几乎一直是）很紧密的。和这些交流紧密相连的原始资本主义是极其先进的，尤其在中心区域尤为明显（特别是伊斯兰文化最强盛的时期：8 到 12 世纪，以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在意大利）。这些交流是社会剩余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但是主要说来，这种剩余财富的集中是和政权的集中紧密相连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文化圈整体从未构成一个“统一帝国”（除了两个短暂的阶段：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它们覆盖了体系的全部中心区域）。一般说来，西欧这一周边区域是极端分散的封建制（这也是周边特征的表现之一）。中心区域则被东方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倭马亚以及初期的阿拔斯）分割，受内部离心力的控制。只有迟些时候，奥托曼帝国才将其再次统一。奥托曼帝国的形成恰恰赶在这个阶段末，此时，原来的中心区域总体周边化，而中心移向了西欧这块从前“周边”的区域。

这个地中海“体系”可否被称为原始资本主义？正面论据是：我们看到了无可争议的原始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私有财产，商业公司，雇佣劳动）。这些因素贯穿了整个时代，在一些地点和时间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伊斯兰区域和意大利），在另一些地点和时间萎缩衰退（尤其第一个千年时在野蛮欧洲）。但我认为，这种存在不足以定义整个体系。因为，在意识形态这个决定性的方面，相反，我看到，这个阶段（公元前 300 年到这